

生态美学的衍化： 从社会城市到浙江大花园

吴晶 周膺¹

【摘要】 霍华德提出田园城市理想 100 余年后的今天,城市超尺度扩张,构成集合乡村的区域城市空间,形成城乡依存的“环境—经济—社会”关联系统。浙江提出的“浙江大花园”计划目前的主要目标是美化乡村和发展乡村旅游,而实际指向是放大的霍华德意义上的“社会城市”,这对中国乡村开发具有启蒙意义。“浙江大花园”既是审美对象,更是生态审美的价值载体。恰当规划建设“浙江大花园”的前提是进行生态审美价值判断,以生态伦理为根基推动审美范畴或审美范式进化,使审美感性与审美理性完全性交融。在审美大众化的同时保存本真性意义上的韵味,并为资源高水平赋值,在农业性、生态性和景观性平衡的基础上使乡村充分释放特有的审美价值,成为浙江人永续可依的生存家园和精神家园。

【关键词】 乡村 社会城市 浙江大花园 生态审美

埃比尼泽·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想产生于简单的机械主义时代,在形式上已不能涵括现代巨型城市,但其理论体系和基本原则仍然有效,长期以来一直以特有的思想深度和适应性引导城乡可持续发展。尽管 100 多年以来它只是以误解、曲解、改编的变体被广泛运用,也还是衍生出诸多具有合理性的专业理论和操作模式。当代中国开始走上大规模开发乡村和对生态健康高度关注的时代,城乡共同体特别是乡村一极面临着价值重估和重建,霍华德城市、乡村、城—乡“三磁体”中的乡村生态价值磁力空前放大,城—乡正在向其所说的具有有机构成性的“社会城市”广域拓展,尤其是高层次的审美判断推动着田园城市理想更高层次实现。从终极方面来说,生态审美价值判断甚至是第一性的。传统的审美观可能限制这种审美判断,现代或后现代意义上的生态美学为我们建立了新的思想维度,甚至是精神资源。浙江省推行的“浙江大花园”计划是一个审美内涵很强的概念,高水平建设“浙江大花园”建立在恰当的生态审美判断基础之上。

一、社会城市与城乡再耦合

霍华德以田园城市“三磁体”阐释城市、乡村和城—乡共同体的优缺点,指出后二者的首要优点是构成自然美景。城市有社会关系多、娱乐场所多、薪金高、就业机会多等优点,也有环境污染、地租高、生活成本高、通勤成本高等缺点。乡村除生态环境优美外还有生活成本低、地租低等优点,也有社会关系少、娱乐场所少、薪金低、就业机会少等缺点。霍华德的理想是构建乡村式城市或城市式乡村,将城市和乡村的优点集合在一起,有效经济地利用土地,既能获得相对独立的生活空间又拥有更多的自由、建立更多的合作关系,既保持良好的卫生条件又能吸引投资创造财富,使人们可以身处自然美景和步行尺度的社区又兼有高薪金与低租金、低税收(以乡村低廉的土地价格为前提)以及享乐等乐观的生活预期。彼得·霍尔、科林·沃德《社会城市:再造 21 世纪花园城市》一书对霍华德的“三磁体”进行改造,将他的“城市—乡村”(Town-Country)更新为“城市—乡村综合体”(Townin-Country),以期进一步整合城乡磁力模式,通过更便捷匀质的可达性、混合用途的土地、新型的城乡社区、可支付费用的住宅、更多的地方就业岗位和健全的公共服务提升发展水平。这事实上不仅是城市改造理想,也是乡村改造理想。

霍华德设想的城市较小,中心城市人口仅约 5.8 万,周边有若干小型城镇(每个人口约 3.2 万)围绕。田园城市理想提出 100 余年以后,城市规模超尺度扩张,实际上构成城市和乡村共构的十分广大的区域城市空间,形成城市与乡村相互依存的“环境—

¹本文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浙江大花园建设的生态美学设计”(课题编号 19NDJC067YB)阶段性成果。

经济—社会”关系统。但它并非不能为田园城市概念所包容。霍华德曾提出,当一个城乡综合体达到一定规模以后便在不远处新建另一个,以放射交织的交通线路将各城市连接在一起,除地面公路外还有地下铁路、市际运河,最终形成城市群。居民如同居住在一座宏大而美丽的城市之中,也同时置身于乡村之中。霍华德还提出通过法律授权从土地所有制和开发权等方面加以控制,以实现每一个城乡共同体彼此不同的发展。他把这种城市群称为“社会城市”。“田园城市—社会城市”由此构成完整的结构体系,为城市发展提供可能的空间向度和时间向度,并从“自由与协作”方面提供个体与社会相结合的社会向度。事实上中国大规模的城市化已经将乡村集合进区域城市或城市区域,城市与乡村日益实现耦合发展。除少数特别边远的乡村外,大部分乡村正在纳入城市区域版图;边远乡村的发展也主要依赖城市的扰动。在此意义上,中国正在形成一个广大无边的“社会城市”。美国区域规划理论将人类生活区域、农业生态区域和自然区域整合为一个整体,以期实现城市格局、城乡格局和生态格局的整体性优化,实际上是“田园城市—社会城市”在所有地理区域的延伸。在此意义上,乡村事实上已经成为城市的一个组成部分。乡村规划建设是城市规划应当同步考虑的问题。

“浙江大花园”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国最早对“社会城市”有所自觉的实践概念。浙江陆域面积 10.18 万平方公里,陆地由浙西南山区、浙中盆地、浙北平原、浙东丘陵、沿海岛屿组成,又有苕溪、京杭运河(浙江段)、钱塘江、甬江、灵江、瓯江、飞云江和鳌江等八大水系,以及西湖、东钱湖等容积较大的湖泊。但有所谓“七山一水二分田”之说,历史上人地矛盾一直比较突出。全省耕地仅约 208.17 万公顷,按 2019 年常住人口 5850 万计算,人均仅约 0.53 亩。经过 40 多年城镇化,城市或城镇周边的用地向极限逼近,经济开发向乡村全面蔓延。但乡村发展仍是低水平甚至是破坏性的,新一代乡村居民大量向城市迁移,不仅使县城及以下城镇(乡)、中心村日益空心化,而且加剧了城市膨胀和城市病。“浙江大花园”的价值目标不仅是乡村旅游开发或乡村产业化,更主要的是借助高速公路、高速铁路与县乡公路的快捷连通,大范围组建城—乡网络系统,对资源进行整合和再分配、互分配,使城乡生活质量均等化、公平化,也使城市产业资源发挥更大的辐射作用。乡村资源和人口可以不转移或少转移,又能与众多城市耦合发展,城市也未必吞并乡村,它们可以共构形成省域共同体,这是“社会城市”理想的更大化实现。这种“社会城市”不仅具有经济、社会功能,更主要是具有人文价值,特别是具有生态审美价值和生态美育价值。这对中国乡村开发具有启蒙意义。

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一书指出,市场过度扩张触发了反向的社会保护运动,19 世纪以来的城市化实际是资本城市化和人本城市化的双重运动。霍华德的《田园城市》、刘易斯·芒福德的《城市文化》、帕特里克·格迪斯的《进化中的城市》等著作表达了这种人文抗争思想,但并没有否定有节制的市场作用,生态经济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当资本开始大举进入乡村之时,生态经济的概念又向乡村延伸。就人文内涵而言,生态审美又是生态经济、生态城市最基本的价值尺度。因此,在理论上理清“浙江大花园”的生态审美价值判断问题具有先导意义。

二、乡村美的本真性及其韵味挽留

“浙江大花园”包涵城市和乡村两部分,主要在广大的乡村地区。乡村的地形地貌改变有限,建筑总体也未现代化,主要保留和呈现的是传统的生态美。乡村居民虽然向往城市生活,但对传统的乡村美仍旧认同。自古及今,人们讴歌乡村美,构成一种艺术经典。而在现代社会,他们赞叹城市的种种奇迹,又想将乡村的美引入城市。然而乡村的美很难移植,它自身也正在一点点消退或者异化。从美学角度来看,“浙江大花园”建设实质上要解决的是乡村美的存在性问题。

乡村在审美上犹如一部艺术经典,对乡村美的关注本质上又是对原生态的珍重。瓦尔特·本雅明一方面为新技术带来的艺术的大众化(平民化)欢呼,另一方面又为由此造成的经典艺术“韵味”(Aura)的消失所叹惋。其《可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文解释说:“一定距离外的独一无二显现——无论它有多近。夏日午后,悠闲地观察着地平线的山峦起伏或者一根洒下绿阴的树枝——这便是呼吸这些山河这一树枝的氛围(Aura)。”^①本雅明用自然意象喻说韵味,其实特定的自然意象恰恰也构成一种经典美,具有审美韵味。以浙江山水风土为例,浙东唐诗之路、钱塘江诗路和瓯江山水诗路以及丽水古堰画乡、永嘉楠溪江芙蓉古村等众多传统聚居地原本都有天然的韵味。但现代城市规模化转移了乡村人口,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将乡村变为消费客体,人作为生物的原生态丢失了,乡村美与艺术美一样在旅游时代被观念性观照或复制而失真。人对乡村美的感知就像用各自的头脑到乡村去被印刷,由此实现乡村旅游的大众消费化。由于时间短暂接触的空间有限,再加上受失真的商业化旅游影像宣传影响以及对吃住

玩的物质性把握,人对原真的乡村韵味很难领会。米歇尔·福柯曾说:旅游中的知识乃由竞争性话语所生产。话语是权力传递和竞逐方式的组成部分。⁽²⁾中国旅游产品重宣传营销轻品质服务,是话语导向的典型。由于对乡村原生态和原真性的城市性把握,导致乡村改造和乡村旅游出现许多美学偏差。

如何在现代的或城市的情境下保有乡村美或“浙江大花园”的本真性是一个思想性命题。本雅明曾无可奈何地说:“在艺术作品的可复制时代中,枯萎的就是艺术作品的氛围。”⁽³⁾后来也认为韵味的丧失暗示人的异化,在《讲故事的人》一文中流露出对传统的缅怀和对传统艺术陨落的痛心。《论波德莱尔的几个主题》一文更借马塞尔·普鲁斯特的作品表达挽留似水年华的意思,企望在韵味重现中重建自我。其实大众化与韵味的保持并非不可调和,现代旅游与乡村的原生态和原真性保护并不一定完全冲突,乡村韵味也不是全部不能保留。关键是对乡村美的本真性把握。

本雅明认为艺术原作有几个重要特点,即本真性、距离性(时空性)以及由它们造成的膜拜性,乡村也有这种特性。本真性即“独一无二”或“此地此刻”。由于存在独一无二性,大部分人难以亲历此地此刻,在历史(时间)和位置(空间)上与之具有不可逾越性,构成可望不可即的审美距离。“浙江大花园”的各个部分也具有独一无二或此地此刻性,这是它们存在的特殊意义。它们的被改造不能脱离这种场所性,抹杀场所就是抹杀本真。特殊场所的移植也是无意义的。譬如浙江古镇中,如果将乌镇模式移植到塘栖古镇,就是对塘栖特殊价值的消解。不可亲历的距离性实际也强化了特殊场所的特殊价值,它帮助我们反观、反思“浙江大花园”各个局部的个性特征,防止城市或主观意志对它们的随意收编。本真的艺术作品所具备的独特的圆满性,与它所由产生的时空紧密关联,由此又构成一种神秘性和权威性,造就了膜拜价值。“浙江大花园”各部分的传扬或形象表达同样具有这种时空特征。虽然对传播有所限制,但各部分不仅自身获得了圆满性,而且因神秘性的充溢获得了更多的审美趣味,可增强现代旅游或投资改造的吸引力。

按照莱昂内尔·特里林的考证,“本真性”一词最早用于判定博物馆藏品的真伪及其价值。⁽³⁾表征的是一种客观的本真性。后来用来指称人的存在性,构成主观的本真性。迪安·麦坎内尔在20世纪70年代将它引入旅游社会学。从社会建构论的视角来说,本没有绝对的本真。“我们都在中途进入社会,而文化始终处于过程之中。”⁽⁴⁾从旅游社会学角度来看,本真是诠释的产物,不同的旅客有不同的认知,往往是他们经验和偏好的投射。新的改变或创建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未来也会变成新的本真。在这种意义上,只有象征的或符号化的本真性、重塑的本真性。它们来源于存在的本真性。存在的本真性指被旅游激活的人的潜在生存状态。城市人将乡村视作理想的他者世界,以怀念、假想的方式构想自然、纯朴、自由的理想生活情境,寻找迷失的本真自我。⁽⁵⁾乡村旅游本带有对本真风景探求的动机,与绘画或电影复制有所不同,但乡村的真实是客观的本真与主观的本真的混合体,也没有绝对的独一无二性。要说膜拜价值,只有生态自然和文化自然的韵味。膜拜价值可以理解为自然和文化的神圣性。与机械复制性质接近的现代旅游提供规模化服务的同时是有可能让旅游者品味到韵味的。在这种意义上,“浙江大花园”获得了改造空间。改造就不能保留原样不动,只是这种改动应当以客观的本真为依据,从时代发展特别是生态发展需要着笔,目标是保有存在的本真性价值,成果是生态美学空间。

因此“浙江大花园”建设本质上是对原生态的差异化重复。哲学后现代转向的最典型特征是以差异逻辑取代同一逻辑,将世界建立在差异的基础上。吉尔·德勒兹在其《差异与重复》序中指出:“所有同一性都只是伪造之物,它们是更具深度的游戏——差异与重复的游戏——制造出来的视觉‘效果’……生活的任务就是让所有重复在一个作为差异之分配场所的空间中共存。”⁽⁶⁾他认为,重复不是一般,而正是差异。这似乎是一个悖论:重复重复了一个“不可重复的东西”。德勒兹对“差异与重复”的一般看法进行了颠覆性重构,将重复仅关涉原型的传统认识扭转回到、面向主体自身。从“浙江大花园”的意义上来说,就是存在的本真性回落。我们不仅要看到乡村旅游的雷同性、模式化及其对本真性的遮蔽,而且也要看到乡村旅游主体的差异性重复特征。“浙江大花园”建设在美学设计上要充分保留和尊重乡村的客观性差异特质,同时也要从审美主体方面发掘主观的重复中的不可重复的可能。如此,“浙江大花园”不仅可以获得本真性,也可以保存韵味。

乡村旅游及其差异韵味的获得是主体对客体的一种心理感应过程。德语 Erleben 和 Erfahrung 这两个词在英语中的对应词都是 experience(经验)。但 Erfahrung 指一般意义上的众历性经验,不仅包括个体的亲历,还有其他间接资源,如习得的知识 and 传

媒信息等。本雅明称其是“曾经存活于人们记忆中的相关的事物”，⁽⁷⁾体现了先人的智慧，其实质即文化传统。Erlebnis 指个体的亲经，限定于与生活直接相关的具有当下性、具体性和鲜活性的经验。Erlebnis 比 Erfahrung 更具有心理学意味，它所强调的是主体当下发生的心理过程及其痕迹。同时，它不是一种纯理智的认识活动，还有情感的参与，是一种渗入情感的理智活动。英文中一般倾向于用 experience 来翻译 Erfahrung，而用 live experience 来翻译 Erlebnis。中文译者又以“经验”和“体验”来加以区别。威尔海姆·狄尔泰又提出“重新体验”概念。在重新体验的过程中，不仅作者的主观精神得以彰显，而且读者的主观精神与作者的客观化了的主观精神之间也相互作用。经验方式在现代已越来越无法同化周围世界的材料了，所以经验维度不断塌缩。但本雅明认为体验所展现的是个体被摘除情感、想象、意志后的分裂、片面的生活状况，是经验的连续性的断裂，使人变成纯粹受反射行为规范的机器，如乡村旅游成为旅游信息轰炸的条件反射。“神经刺激迅速地相继涌入人体”，人因此陷入无数震惊之中。⁽⁸⁾在体验的分裂的世界里，诗已不再能够自洽圆融。只“可能是这样的：诗人在荒漠的街道上从词、片断和句头组成的幽灵般的大众中夺取诗的战利品”。⁽⁹⁾本雅明的看法有点绝对，但确实是现代人所要注意的。震惊使人惊醒，让人摆脱静观或僵化的思维模式，提升反思批判能力，但也会异化人的生活或人本身，这是必须防范的。“浙江大花园”的规划建设离不开经验的积累，但也要制造由差异或强度引发的震惊，或者说是惊奇，让旅游既具有新奇感又不是孤独之旅，既有家园感又有花园感。

不仅如此，“浙江大花园”还有更高的建设使命。本雅明《德国悲剧的起源》一书指出，现代艺术最为恰切的表现形式只能是巴洛克悲剧式的“寓言”：自然的颓败和人性的堕落。20 世纪以来充斥艺术舞台上的“局外人”“空心人”形象表明人类经验不断贬值，人们试图采取一种文化策略来抵抗技术时代充满震惊体验的生活，那就是通过写作即运用普鲁斯特所说的“非意愿的记忆”（情绪记忆）的方式构建一个精神整体，回到充满先辈气息的传统之中。但这种反抗是极为困难的。前人深刻的自我批判提示我们，“浙江大花园”不能作为新时代的经济性买卖，它不属于任何买主。尽管它是城市的审美对象，但却不是传统的城市，不是城市用金钱收复的商品。它也决不是“田园城市”或“社会城市”的通俗版，不是新时代的大众文学，而是生态审美主体的独有创制。这意味着，构建“浙江大花园”的基础是生态审美主体的形成。只是这种审美主体并不能凭空出现，它是在审美创造中逐渐化育的，是生态美育的成果。而这取决于我们是否主动将“浙江大花园”建设同时作为一个生态美育实践过程。“浙江大花园”不是乡村的修复者，而可能更是城市的永远的修复者，是人性的永远的修复者，是健全的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的象征，是永恒的艺术作品。

三、审美理性与价值判断

现代西方盛行的非理性主义否定长期以来居于霸权地位、压抑人性的工具理性，对人性的经验性复归具有积极意义，但理性的正面价值从来不容否定。对于传统非理性功利主义盛行的中国来说，不但需要理性启蒙，更需要理性主体的建构。中国传统的功利主义并非“理性经济人”意义上的理性，而恰恰是忽视价值判断的非理性。由于缺乏审美理性，传统中国人很容易将外在事物当作实现功利目标的生产资料或工具。这种潜在意识与现代大生产相结合的后果容易带来对自然生态的大规模破坏。现代美学强调审美感性，其实审美感性与审美理性不可分割，审美感性蕴含着审美的内在价值和目的。康德认为审美是纯然的感性方式，但他所说的先验感性形式不同于一般的感性感性，其中内含善的理念，“形式因”“创造因”与“目的因”相一致。既强调美在于感性形式，又赋予美以超感性内涵。审美理性是以价值为导向的理性，蕴涵着信仰追求。不但包含分析、反映、再现、表现等认识论功能，而且赋有自我超越、自我完善的崇高理想，有意志自由、伦理规范、诗意生存等内涵，昭示生命的存在价值。它超越于工具理性的功利价值，而且可能是克服工具理性局限的唯一武器。“浙江大花园”建设应当秉持审美理性进行正确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克服功利主义取向。

20 世纪以来，尽管非理性主义盛行，但除极少数人持后现代多元立场外多数人对审美判断持康德式理解，将其理解为有理性依据的行为，并且进行了更为明晰的分析。肯德尔·L. 沃尔顿在《艺术范畴》一文中提出的弹性模式强调，审美判断或艺术欣赏是在艺术范畴的指导下作出的，其实质是特性中心欣赏，艺术范畴即特定的艺术风格或标准。欣赏毕加索的名画《格尔尼卡》必须按照立体主义范畴，用其他范畴就不恰当。依据不同的艺术范畴，可以得到 3 种不同的审美判断即标准的、可变的和反标准的。特定的作品用特定的范畴判断和欣赏显得恰当，但对超出该范畴的作品也有一种特殊的自警功能：当已有的艺术范畴不足借鉴时，也许意味着崭新而伟大的变革正在来临。艺术正是在“标准的一可变的一反常的”3 把游动标尺交替应用中创造性发展的。⁽¹⁰⁾

艾伦·卡尔松将沃尔顿的思想拓展到自然界,强调自然审美判断的客观性。他提出用自然科学知识构成的审美范畴对自然对象的审美价值作出恰当、客观的判断。这一模式具有分析哲学特征,所以又被称为分析模式。卡尔松指出,审美判断并非下一个简要断语表达个人的审美态度或价值倾向,而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工程。可靠的审美判断由描述、阐释、评估 3 个环节构成,是一个客观过程,由许多相关的标准和限制所控制。简单的价值判断没有真正的价值,因为它没有分析基础或思想基础,使审美变成无本之木或偏见。分析性的审美判断看似主观,实际上具备客观知识的基础以及大众意见,最大限度地规避了纯主观和个人性因素,是一种更可靠的社会共识,具备可验证、可辩驳、可共享的理性品格。卡尔松的审美判断是对康德审美愉快具有主观的合目的性和基于共通感的主观普遍性、必然性的一种深入解释,将审美判断与以逻辑、科学为代表的理性认识活动高度统一。在康德那里,理性在审美判断中是无意识的,卡尔松的客观性审美判断将理性作为一种自觉的追求,这是巨大的认识进步。

卡尔松的自然美学具有浓厚的精英、专业色彩。他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提出:社会大众的审美趣味集中于表面化的形式主义欣赏,审美偏好是外在、肤浅的。景观评估不宜取社会大众景观偏好之平均数,而应听取环境批评家对景观审美价值的意见,因为他们才具备足够的环境知识和审美敏感性。⁽¹¹⁾不过,虽然审美判断有关天赋,乃至可能是天才的独特能力,培养或提高社会大众的理性分析能力仍有一定可能性。只是需要作出巨大的努力。事实上,目前对乡村旅游或乡村改造的理性批判在更广大的层面上深化。对它所造成的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破坏多有批评,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文化自觉意义上的批评,如自然性的消失、乡村性的消失、农民身份的消失等。新的生态性的审美范畴正在形成,乡村旅游或乡村改造开始接受新的审美判断。世界上最大的非政府旅游组织第三世界旅游国际同盟(The Ecumenical Coalition on Third World Tourism)前执行官科森·斯里桑甚至极端地说:“今天践行的旅游,尤其是第三世界的旅游并不能使多数人获益。相反,它盘剥他们,污染环境,毁灭生态系统,导致文化退化,使人们丧失传统价值观和传统生活方式,屈使当地妇幼遭受性奴役。换言之,旅游成了当今不公正的世界经济秩序——其中少数掌控财富和权力的人才有话事权——的缩影。由此看来,旅游与殖民主义几无二致。”⁽¹²⁾斯里桑之所谓在中国未必普遍,但已经为更多的中国人所担忧。乡村旅游问题也正是“浙江大花园”建设的问题。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大花园,这是需要理性分析的。要运用卡尔松的描述、阐释、评估方法,深入分析其存在本质,充分评估它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特殊价值。抛弃诸如“美化环境”“旅游致富”等旧的审美判断,更多地从生态、人性价值范畴更新和提升审美趣味,使乡村实现创造性发展。

四、以生态审美价值判断为资源赋值

“浙江大花园”规划设计是以景观生态学为理论基础、科学安排乡村物质和文化空间以创造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整体优化和美化的乡村进化方案。康德曾说,美是道德上的善的象征。生态审美是以生态意识为范导的审美,它不仅是单纯的感官愉悦,而首先是一种伦理活动。生态伦理追求的价值内在于生物圈的协同性和稳定性之路,要求人类将维系人与自然共生的关系作为生存智慧和审美前提。这种生存智慧并不抹煞人和其他生物的本质区别,并非放弃人的文化属性,明智的共同进化和自我保护使得人与自然获得共存共荣的生态基础。生态审美价值超越于传统的人类审美偏好,是对人类中心主义审美习性的反驳。在“浙江大花园”规划建设时,首要的是对资源的生态价值作出理性评估,并对这种价值的保护和提升进行科学研究。生态价值评估是执政者、规划师、科学家与在地利益人交流对话的综合结果,要特别突出科学家的首要作用。

对“浙江大花园”的审美也可能是内在的交融性审美。阿诺德·伯林特在现象学的基础上提出“交融美学”概念,其实生态审美与生态伦理本也是可以交融的。交融性审美不仅超越于主客二分,而且将审美认知与审美情感融为一体,审美伦理与生态审美完全统一。在此境域中,“浙江大花园”的资源价值可以实现最大化。理想境界未必能达到,但可以努力将生态伦理内融于生态审美或文化审美,使“浙江大花园”规划建设转化为具有内在生态目标的审美活动。

要实现生态伦理目标和审美融合目标,“浙江大花园”规划建设必须遵循如下一些基本原则:一是整体综合性原则。乡村景观是一个有机整体,具有自然与文化复合的复杂结构,所以不能离开一定尺度的大环境分裂性地强化局部,不能离开整体搞单一性的单项美化或开发。一切项目开发必须有利于整体资源环境的优化。二是生态多样性原则。生态多样性既是生物和其他自然资源丰度及其变异性、复杂性和稳定性的反映,同时也是文化多样性的基础。要在生态多样性的基础上突出和强化区域景观个性,也要在此基础上表现特色传统文化,尤其是具有生态性质的地域文化。三是敏感景观优先原则。敏感景观或环境敏感区是区域具

有突出特征的关键部位,这一部位以其资源集中、特具特色而成为区域生态的代表。而因资源特别珍贵所以又往往是环境脆弱地区,一旦被破坏就难以弥补。相应的景观规划设计要特别强化对它的保护,防止不当的景观改造或过度开发。要以敏感景观为核心,整合优势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因素,对整个区域进行整体特色化的意象性规划设计。

“浙江大花园”规划建设要充分保护并完善景观结构。坚决防止对景观结构的异质化改造,并弥补有缺失的薄弱环节,使整个区域生态结构更加完善、健康、稳定。基本方法是通过廊道和斑块将区域中每一种景观要素都纳入景观规划设计范围,建立完整、丰富、自我支持的生态系统。应当充分利用生态工程方法最大限度减少对环境的人工改造。自然栖息环境具有自我循环的有机结构,并具备人工环境所没有的抵御外力破坏的能力以及自我更新、复生的能力。建立在这种栖息环境上的景观是人与自然的交融性景观,甚至可以看作是自然环境的自我设计。它既是低人工管理成本的,又是可以永续利用的优质资源。要注重保留村庄原始风貌,不进行大面积硬地铺装,保持原有道路、排水系统线型,保护山、水、田、林、园、塘等自然资源,努力做到不推山、不削坡、不填塘、不砍树、不改路。不盲目仿照城市绿化模式种植草皮、观赏灌木等,充分利用原有植被和结合农业生产绿化环境,或结合经济作物种植创作大地艺术。尽可能利用天然能源或可再生能源,使用无害化、可降解、可再生、可循环建筑材料。通过物理空间设计创造良好的声、光、热、水、电、暖环境。

“浙江大花园”建设给乡村规划建设带来新的历史性机遇,也发现代中国“社会城市”建设之先声。如何深化认知,对乡村进行恰当的生态审美判断,是解决这一课题的极为重要的方面。乡村景观规划建设应实现资源的农业性、生态性和景观性平衡,使乡村充分释放特有的审美价值,并成为永续可依的生存家园和精神家园。

注释:

1 瓦尔特·本雅明:《可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载瓦尔特·本雅明:《经验与贫乏》,王炳钧、杨劲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65、264页。

2 Stuart Hall, *The West and the Rest: discourse and power*, in Stuart Hall and Bram Gieben, ed., *Formations of Modernity*, Oxford: Polity Press, 1992.

3 Jacob Golomb, *In Search of Authenticity: From Kierkegaard to Camu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Press, 1995.

4 Edward M. Bruner, *Abraham Lincoln as Authentic Reproduction: a Critique of Postmodernism*,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96(2), 1994, p. 407.

5 Wang Ning, *Rethinking Authenticity in Tourism Experience*,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6(2), 1999, pp. 349-370.

6 吉尔·德勒兹:《差异与重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页。

7 Walter Benjamin, *Selected Writings*, vol. 2,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553, 735.

8 Walter Benjamin, *On Some Motifs in Baudelaire*, in *Illuminations: Essays and Reflection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Inc., 1968, pp. 174, 175.

9 瓦尔特·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魏文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136、53页。

10 Kendall L. Walton, *Categories of Art*, *Philosophy Review*, 79 (3), 1970, pp. 334–367.

11 Allen Carlson, *On the Possibility of Quantifying Scenic Beauty*, *Landscape Planning*, 4 (2), 1977. Allen Carlson, *Formal Qualities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Journal of Aesthetic Education*, 13 (3), 1979.

12 Koson Srisang, *Third World tourism: the New Colonialism?* *In Focus*, 1992 (4).